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Zhongguo Chubanjia
Luo Zhufeng
中国出版家
罗竹风

柳斌杰 主编 许志杰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出版家丛书
ZHONGGUO CHUBANJIA CONGSHU



柳斌杰 主编 许志杰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 益
封面设计:肖 辉 姚 菲
版式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家·罗竹风/许志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12

(中国出版家丛书/柳斌杰主编)

ISBN 978-7-01-019033-4

I. ①中… II. ①童… III. ①罗竹风(1911~1996)—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2788号

中国出版家·罗竹风

ZHONGGUO CHUBANJIA LUO ZHUFENG

许志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20 插页:4

字数:250千字

ISBN 978-7-01-019033-4 定价:7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兼主编)

柳斌杰

副主任(兼副主编)

邬书林 吴尚之 吴道弘

执行副主任(兼执行副主编)

吴永贵

委 员

袁 亮 周 谊 于国华 李景端

黄书元 郝振省 魏玉山 于 青

王 彤

出版说明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

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 50 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 20 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入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前言

罗竹风（1911—1996），原名罗振寰、罗震寰，曾用笔名田牛、陆旭、骆漠、戴春雨等，山东省平度县（今平度市）人。他是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出版家、杂文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辞书编纂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名誉主席；任《辞海》常务副主编，主编《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杂文卷，是《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之一。

罗竹风于1931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其间参加北大学生南下爱国请愿活动，创办报纸《北大新闻》和杂志《冰流》。他以笔名田牛在《冰流》杂志上发表小说《潮汐》、《建设》、《这一群》等作品，并于1934年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上以陆旭为笔名发表了杂文《看画》，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罗竹风最早的一篇杂文。而笔名陆旭有人认为是鲁迅的谐音，或可管窥青年罗竹风对于鲁迅先生的敬慕始自北大。由此可见，罗竹风成为著名杂文家非一日

之功，他的内心世界早有一个杂文家的梦想。创办《北大新闻》和《冰流》，则是作为出版家的罗竹风留下的第一串脚印。此后，他便再也没有停下为出版事业打拼、探索、前行的脚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以说，出版工作是贯穿罗竹风一生的事业主题，生命主线，社会根基。

学生时代，他参与创办报纸、刊物；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更是义无反顾，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组织领导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在担任八路军三支队八大队政委和平度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同时，他还兼任《抗战日报》社社长，主编《海涛》半月刊，亲自撰写了大量关于抗日战争的社论、政论、时评，极大地鼓舞了胶东地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胶东地区是八路军控制区域较大、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武装抗日烽火连天，文化抵御日军侵略同样如火如荼。除了前述罗竹风亲自担任社长、主编的报纸、杂志之外，还有《胶东大众》、《胶东青年》、《大众画刊》、《农村戏剧》、《文化防线》、《大众报》，宣传力度非常强大。罗竹风既是这些报刊的组织者、策划者，也是主要撰稿人。文章种类涉猎广泛，既有小说，也有政论、文艺评论、杂文，还有多篇关于新文字改革的文章，如《猛烈开展新文字运动》、《从新文字的理论到实际》，今天读来依然有诸多启迪。对罗竹风冠以语言学家，许多人不甚理解。翻看抗战时期乃至更早一些他关于新文字推广的鸿篇巨制，你就会懂得罗竹风作为语言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有人问，为什么罗竹风能够从一个杂文家而衍生成那么多的“家”，接任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的李储文作如是说：“他在年轻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一生勤奋好

学，锲而不舍，从不浅尝辄止，更不哗众取宠，孜孜不倦地寻求知识，追求真理。”^①

通俗地说起来就是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罗竹风作为军代表接管山东大学。经历了一系列的整肃、理顺、规整之后，在校长华岗的领导下，山东大学迅速找到了教学、科研的正确途径。《文史哲》杂志的创办，便是这一时段山东大学发展的明证。《文史哲》是一本同人杂志，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初期的《文史哲》便办得有声有色。毕竟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业荒废，百废待兴，稿子虽然不成问题，但印刷、发行却是离了钱寸步难行的。于是，主编杨向奎亲自到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部门跑钱，作为山东大学教务长的罗竹风则是跑邮局协调杂志的发行工作，使居于一隅的第一份由大学创办的学术刊物，迅速走向了全国。罗竹风后来回忆说：“1951年初秋，华岗同志作为上任不久的山东大学校长，他应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邀约，曾到上海述职。陈毅元帅在一次宴会上，曾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应当仿效。”^②

《文史哲》创刊不久的1951年8月，罗竹风奉调赴上海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听从党的调遣，是罗竹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从他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离开山东大学有种种的不舍，但还是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七十四岁自述》的长文中，罗竹风说：“这一段是最值得我怀念的，可惜时间并不长，如果能够继

① 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编：《罗竹风纪念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罗竹风：《回顾以往 激励未来》，《文史哲》1986年第5期。

续下去，那该多好呀。”^①从他之后对《学术月刊》的支持来看，其实，罗竹风的心里还是放不下自己参与创办的《文史哲》。1957年《学术月刊》在上海创刊之后，他说：“全国性的学术刊物还不多，只有《新建设》、《文史哲》两家，《学术月刊》创刊后，可谓鼎足而三了。”《新建设》在北京，《文史哲》在山东，《学术月刊》在上海。罗竹风身在“曹营”，心却一直记挂着《文史哲》，《学术月刊》的创刊其实是他深藏心中的那份情愫的延展。此后几十年，罗竹风一直努力呵护着《学术月刊》，使其茁壮成长。这既是他对一份学术刊物的厚爱，更是他希望借此实现风清气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营造一种学术研究氛围的远见所在。

初到上海，罗竹风的职务是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秘书长，围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展生产自救和增产节约运动。第二年，他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不久被任命为宗教处处长。从此，罗竹风一直在上海工作，无论抗美援朝，还是宗教事务，都容不得半点拖沓和延误，都是关乎国家安定、民族进步的大事。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的罗竹风，全身心投入其中，以满腔的热忱把自己本不熟悉的陌生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卓有成效。现在我们说罗竹风是宗教学家，起点就在他出任宗教处长这四年多的时间。正是这不寻常的四年，让罗竹风熟悉了宗教的历史、文化，以及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中国宗教。“文化大革命”时期，有造反派找他调查曾任金陵神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的问题。罗竹风用一句反问，把造反派问得哑口无言：“共产党办党校，校长总是会写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那

① 罗竹风著：《杂家和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么，怎么能够期望一个基督教神学院的院长，写出宣传无神论的文章呢？”^①此语彰显了罗竹风对宗教工作的真知灼见。当然，如前所述，出版是罗竹风贯穿一生的事业，他之所以被誉为著名宗教学家，在于此后他对宗教学的精辟总结和深邃阐述，都以出版的形式体现在了这些不朽的典籍之中，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人·社会·宗教》、《上海宗教史》、《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选编》、《宗教学概论》等。每一部书在当时都是启蒙性和建设性的宗教学开山之作，对于中国宗教学的研究、教学、实践，具有开拓性和引领作用。

罗竹风从一个业余或者说兼职出版家到职业出版家的角色转变，是他1957年11月被任命为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之后。如果说，此前他做了一系列与出版有关的工作，属于兼而有之的话，那么出版局长则是踏上了名副其实的职业出版家之路。一个出版家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学识、胆识、情怀、眼界，以及对出版事业的前瞻、驾驭、把握，作为出版局长必不可少。尤其是对当时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长，要求尤甚。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发源地，在这里曾经诞生了影响至今的多个出版机构，涌现出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鲁迅、邹韬奋、郑振铎、李小峰、叶圣陶、赵家璧、赵景深等一批出版大家。要做好上海市出版局局长，没有自己的主见是难以打开局面的。罗竹风上任之初，首先要求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出版方向，在这个基础上“百花齐放”。他以“多出书，出好书，形成规模，形成优势”作为出版方针，严格按照“坚持质量第一”的基本原则，

^① 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编：《罗竹风纪念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保持了上海图书出版工作全国前列的势头。

在1959年《上海出版工作》第三期上，有一篇罗竹风《对提高书籍质量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今日读来依旧耳目一新，仍可作为现代出版工作的指导性文献。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制定年度选题计划和长远选题计划，选题是出版工作的龙头，龙头先行，可以带动全盘。

二是经常开展组稿活动，千方百计地开辟稿源。只有稿子多起来了，有回旋的余地，编辑才会心情舒畅，从而提高书籍质量。

三是计划有了，稿子也有了，编辑加工很重要。编辑要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从书的内容到形式，都必须认真对待，一丝不苟。

四是出版社除每年出版的新书之外，还必须注意修订旧书，使之有再版的机会。

总之，罗竹风的要求是，质量第一，多出好书，宁缺毋滥，决不凑数。

要知道，罗竹风说这话的时间节点和社会背景，是在1957年反右，隔年“大跃进”，那样的大气候之下。我认为这应该就是罗竹风出版思想要义所在。正是在罗竹风这样出版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出版系统接连推出深受读者欢迎的好书，代表作就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不知道有多少人读着《十万个为什么》长大，甚至可以说这套书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罗竹风作为出版家对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贡献，是他对编辑角色的思考，他提出的编辑“杂家”说，可谓其编辑思想的核心。1962年5月6日，罗竹风在《文汇报》副刊“笔会”，发表署名“骆漠”的杂文《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本来这就是一篇稍带一些个人

见解的杂文，或者说是一篇探讨编辑工作性质的短小精悍的论文，没料到却成了此后数年罗竹风被无休止揪斗的借口。《杂家》发表一周之后，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姚文元也在同一张报纸的同一副刊同一位置抛出《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从标题就能看出其针锋相对的用意。姚文元还附一短信，声称：“如果你们还允许我争鸣的话，请把此文照登。”

罗竹风和姚文元两篇观点迥异的文章一经见报，立即引来如潮的“支持”与“反对”。《文汇报》编辑部共收到六十多封读者来信，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姚文元，力挺“骆漠”。同样是编辑，深知作为一名编辑不易的《文汇报》工作人员，在征得领导首肯之后，准备将这些来信整理，在报纸上开展“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讨论。在上级主管领导的干预下，《文汇报》准备的讨论还没有讨论起来，就被捂下了。然而，罗竹风因《杂家》而闯下的祸根并未拔除，有关领导甚至对他直接点名：“老罗哪，你那篇《杂家》，就是有些伤风、感冒，要注意！”“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①时间不长，罗竹风便顶着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的官帽，被安排专心去搞《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去了。从此，罗竹风也结束了自己五年多的职业出版家生涯，而走上了职业辞书编纂家的道路。

是年，罗竹风 52 岁。

关于《辞海》的修订是从 1957 年开始的。当年，毛泽东视察上海，在谈到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高地应当有更大作为时，他提出上海

^① 张忠强著：《罗竹风传略》，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版，第 173 页。

出版界和文化界要修订 1936 年版的《辞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指定石西民主管，主编 1936 年版《辞海》的舒新城继续担任主编，罗竹风任副主编。这是毛泽东嘱托的事，是罗竹风作为辞书编纂家接手的第一项重大任务。1958 年春，《辞海》修订编纂工作进入启动阶段。罗竹风作为上海市出版局领导，首先抓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组建工作，对干部的配备、人员调动、选择办公场所等问题，一一过问，帮助落实。《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从此有了一个专司其职的工作机构和一支具有相当水准的编辑队伍。

如何将一部编纂于二十多年前的“旧”《辞海》，修订为符合时代特点和具有前瞻性的“新”《辞海》，罗竹风把修订方针概括为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他对释文原则和表述顺序，以及力求内容详略、深浅、适当，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释文内容必须切题，不可东拉西扯，罗竹风形象地定为“四至”说，即“东至墙、西至庙、南至沟、北至道”。经过五年多的艰辛修订，1961 年 10 月，《辞海》出版了以二稿“试写本”为基础，按学科分类编排的内部发行“试行本”16 分册；1963 年 4 月，又在“试行本”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完成了继续供内部修改使用的“试排本”60 分册；1965 年 4 月出版了《辞海》（未定稿）版，全书收词 98000 条，总字数达到 1160 多万字。虽称“未定稿”，实际已经达到了公开出版的要求和标准。

其后，《辞海》的修订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摆状态。“杂家”事件沉渣泛起，《杂家》一文被打成“反党大毒草”，罗竹风被扣上八顶大帽子，遭受了批斗、抄家、下放劳动改造等一系列迫害。

罗竹风在遭受了长达 10 年的迫害之后，1976 年 10 月获得了重

新工作的机会，被临时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组，编辑《中华文史论丛》。两年之后的1978年，他得以平反并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任《辞海》副主编。他对那十年遭受的迫害并没有过多的纠结和怨恨，反而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讨”。罗竹风曾经这样说：“二十多年来，《辞海》的修订任务未能及时完成，我们有愧于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愧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有愧于‘望眼欲穿’的所有读者们。”^① 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工作热情啊。1978年底开始编纂新1979年版《辞海》。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罗竹风坐镇编辑部，挑灯夜战九个多月，保质保量准时地让1979年版《辞海》面世了。

罗竹风对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工作，作了这样的总结：

其一，辞书是工具书，不同于一般书籍，不是一家之言，不是一般的评论文章，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举例说，“假如习仲勋一直不露面，彭德怀尚未平反昭雪，对于解放战争的第一野战军，究竟应当怎样写？没有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对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岂不是莫大的讥讽。”^②

其二，辞书不是从头到尾读的，而是备查备用的工具书。《辞海》体例规定，大条目不过四五百字，中条目三百字左右，小条目只有一二百字。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大约就可以概括了。

其三，应当依靠知识分子，特别是依靠专家学者编纂修订辞书。修订《辞海》属于提高性质的工作，需要专长，离开专家学者是无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① 罗竹风著：《行云流水六十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 罗竹风著：《行云流水六十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罗竹风认为，对比1936年版《辞海》，1979年版《辞海》可谓面目一新，第一，条目增多、更新了。第二，释文更加确切稳定了。第三，整个内容充实了。第四，文风更加简洁了。第五，知识性得以全面贯彻。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在总结中改进，在改进中完善，这是罗竹风从事出版工作的操作思路。正是由于罗竹风有修订编纂《辞海》的心得，他主编《汉语大词典》时，才轻车熟路，其工作方法和编纂手段、出版思想，日臻成熟。《汉语大词典》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编纂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罗竹风提出了“三驾马车”的工作方法。第一驾马车，是为后勤保障提供人力、物力的工作委员会；第二驾马车，是由吕叔湘担任首席顾问，王力、叶圣陶等14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顾问委员会；第三驾马车，是由72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三驾马车”在主编罗竹风的统一指挥驾驭下，齐头并进。曾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副社长的阮锦荣和孙立群说：“三驾马车”不仅为顺利编纂《汉语大词典》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的大型辞书编纂树立了组织架构的典范。从此，“三驾马车”带领着华东五省一市几十个编写组、几百名专家学者跨越了举步维艰的初创期，共同为营建《汉语大词典》这座文化长城而工作。

毋庸置疑，罗竹风作为出版家，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已经与时下出版界的境况大不相同了，可能有人会认为罗竹风的出版思想已经过时了。在当今社会，传统出版业面临着新媒体、自媒体和新兴阅读方式的全面挑战，出版家是否还有立身之地呢。如同当年毛泽东决策修订《辞海》、周恩来拍板编纂《汉语大词典》一样，罗竹风应运而生，成

为了那个时代成功的出版家。当今出版业依旧需要更多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企业家决策能力和自觉意识、敢于担当的出版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适应新需求、新发展的出版事业中来。新一代出版人可能很难像罗竹风那样“又杂又专”，行行成家了。毕竟，像罗竹风这样的出版家，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并不多见。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出版人所应有的角色自信、文化自觉、担当精神、社会情怀，是不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消磨殆尽的。

应国靖先生在编辑罗竹风的《杂家和编辑》这本书时，于后记中这样说：“在我选编这本集子时，既是我的再学习过程，也使我更全面地认识了罗老，我衷心祝愿罗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需要这样博学多才、忠厚仁慈的学者。”^①亦如应国靖先生所言，写作本书的过程，既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出版界小兵，对罗竹风为代表的老一代出版家的敬意，也是不断修正自己的出版想法，向老一辈出版家再学习、再致敬的心路历程。

斯人已去，罗竹风留给出版事业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珍惜，就是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矿藏。每当想起罗竹风在修订编纂《辞海》时，以古稀之年，将1340余万字的《辞海》通读一遍时，不禁心潮澎湃，难以自抑，甚至在写作中几次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让我们一起走进罗竹风的出版世界吧，弘扬他的出版思想与精神，努力前行，再前行。

① 罗竹风著：《杂家和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7页。